

# 林超民文集



## 第三卷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park.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is a path or a grassy area. In the background, there are several trees, some with bare branches and some with leaves.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quiet and natural.

# 林超民文集

## 第三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林超民文集.第3卷 / 林超民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222-06311-2

I . 林… II . 林… III . ①林超民—文集②史学—文集③高等学校—学校管理—文集 IV . ①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0 ) 第000080号

责任编辑 张 波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洪中丽

|        |                        |
|--------|------------------------|
| 书 名    | 林超民文集 ( 第三卷 )          |
| 作 者    | 林超民                    |
| 出 版    |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发 行    | 云南人民出版社                |
| 社 址    |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
| 邮 编    | 650034                 |
| 网 址    | www.ynpph.com.cn       |
| E-mail | rmszbs@public.km.yn.cn |
| 开 本    | 787 × 1092 1/16        |
| 印 张    | 21                     |
| 字 数    | 360 千                  |
|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印 刷    |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
| 书 号    | ISBN 978-7-222-06311-2 |
| 定 价    | 70.00 元                |

## 谢 词

有生以来，自己每前进一步都得到父母培育、师长教诲、学友襄助、家人体贴。其深恩大德、高情厚谊、仁爱慈惠，我刻骨铭心、没齿不忘。

衷心感谢我的导师方国瑜教授、江应樑教授！

衷心感谢我的父亲林树焜、母亲谢庭芝！

衷心感谢我的诸位师长：马曜教授、李埏教授、杨堃教授、李德家教授、缪鸾和教授、张德光教授、马开樑教授、李为衡教授、马忠民教授、李英华教授、尤中教授、木芹教授、熊锡元教授、杜国林教授、徐文德教授、武希辕教授、张尚谦教授、赵瑞芳教授、谢本书教授、朱惠荣教授、何耀华教授、黎家斌教授、罗秉英教授、郑志惠教授等！

陆韧、树才、永进、先林、海梅、周琼、顺宝、王璞、文辉、立英、姚珏、志英、志芬、李燕、亦武诸位与我同门同窗同事，多年来在一起切磋学问，商量旧学，增益新知，深得他们的热情关爱、无私帮助，给我终身受益，铭感之情难于言表。

杜娟教授、黄纯艳教授、甘雪春教授、刘本军教授、李洁教授、袁国友教授、李东红教授、王世丽教授、周智生教授、马勇教授、黄兴球教授、宇应军编审、郑卫东编审、黄显松编审、王东昕博士、王燕飞博士、王艳萍博士、杨丽娥博士、西绕云贞博士、陈元惠博士、陈国保博士、冷琪雯博士、付春博士、赵启燕博士、史允博士、文婷博士、林谦一郎博士、浦哲文博士（Dr.Jeef Book）、华思文博士（Dr.Steven L.Watkins）、立石谦次博士以及诸多学友与我教学相长，互有启迪，谊属同舟，感纫无既！

田玲贤棣为我整理、校对稿子，扫描图片，尽心尽力，求善求精。铭感殊深，特鸣谢悃。



我的兄弟姐妹自幼相亲相爱，无时不在关心、帮助、支持我，恭录他们的名字以表谢忱：林健民、林虹民、林韵民、林达民、林静民。

妻子李芸自我们相知相识以来，始终与我携手并肩，相扶相助，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无需把心头的谢意再次表白，也无法用语言表白！

儿子林涛、女儿林涓没有辜负我的期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他们给我的欢欣自不必言谢。

老树春深，苍龙日暮，天高路远，山重水复，我当不负师友亲人，自强不息，奋蹄向前。

林超民 谨识

2009年新春

# 自序

1962年9月，我从滇西边城腾冲到省城昆明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系。这时，经历“大跃进”、“自然灾害”的祖国，进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阶段。当年大学招生，大幅度压缩招生数量，确保质量，坚决贯彻“宁缺毋滥”的原则。云南大学8个系仅招生486人，为1960年1173人的41.43%。我所在的腾冲第一中学高中十九班，近五十名学生，只有4人被录取。据说昆明第一中学等名校，升学率也不超过30%。

在新生入学教育会上，我听说云南大学有两个名人：一个是党委书记兼校长高治国，一个是历史学家方国瑜。

高治国校长于1961年4月和8月在《光明日报》上接连发表《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两篇文章，在中国教育界产生巨大影响。我们一进校，就对高校长敢于批评1958年以来教育战线极左思潮的大无畏精神由衷敬佩，并庆幸我们有这样一位好校长。高校长时常深入学生宿舍聊天，到教室听课。他是一位作风朴实、态度谦和、平易近人的好领导。1964年高校长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不久升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翻在地”，惨遭迫害。1973年复出，任云南省建委副主任、主任。1977年2月至1979年3月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1985年5月30日上午，时任中共云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高治国亲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从头至尾听了我的答辩，并在答辩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老校长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鼓励我在中国民族史与云南地方史的研究上不断前进、有所创新，作出更大成绩。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此情此景，恍如昨日。

方国瑜是全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民族史、云南地方史诸方面成就卓著。1963年4月20日在云南大学校庆40周年举行的学术演讲会上，方国瑜教



授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报告，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久已敬仰的学术大家，聆听他的演讲。1978年9月，我成为方国瑜教授的第四届研究生，1982年9月，成为他的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博士研究生。

1983年12月24日，国瑜师突患脑溢血，不幸病故。我即撰写了悼念国瑜师的文章，在《民族工作》、《史学论丛》等刊物上发表了《方国瑜传略》。

国瑜师去世后，在江应樑教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论文，通过答辩，成为中国民族史第一个博士，云南省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博士。

1988年11月11日应樑师心脏病猝发，驾鹤西游。我写了悼念应樑师的几篇文章，寄托我无尽的哀思。

2000年，《云南日报》在头版开设“敢为天下先的云南人”专栏，我即撰写了《高治国顶风奋进为教育》、《开拓中国民族史学的大师方国瑜》、《西南边疆民族学的开拓者江应樑》等三篇文章在这个专栏上发表。后来，又为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写了高治国校长、方国瑜教授、江应樑教授的文章，编入《科教群英谱》，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2年9月10日教师节，云南大学历史系举办“纪念李埏（幼舟）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庆祝会，出版《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这是云南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卓有成就的教授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对于尊师重道、弘扬学术、促进教学、培养人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为这次活动的倡导者与组织者，我写了《银杏不老志千里 松柏常青霞满天——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一文。

从跨进云南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在云大历史上最杰出的校长是数学家熊庆来教授。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熊校长几乎被淡忘，既有岁月的消磨，更有人为的湮没。直到1980年以后，熊校长对云南大学的贡献才又被发掘出来，重放光辉。熊校长执掌云南大学的12年中，云大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日新月异，被认为是云南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而且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黄金时代”。近年来，纪念、赞扬、歌颂熊校长的文章甚夥。我以潘光旦对熊校长的批评为题，写熊校长“对学术岗位的坚守”。这是云南大学能够跻身于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列的重要原因，也是许多纪念熊校长的文章没有注意到的重要理念。我对熊校长坚守学术岗位的执着十分敬佩，特写一篇短文着意介绍。

兹将纪念国瑜师、应樑师、幼舟师、熊校长、高校长以及我敬爱的师长学友的几篇文章作为本文集的第一部分，以表达我对他们的尊崇、敬仰、怀念和感激之情。亦希望年青的一代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和精深学术，薪火相

传，继长增高。

大学毕业后，我被安排到解放军农场接受近两年的再教育，然后分配到勐海茶厂工作三年多，1973年5月调到勐海县第一中学任教。1978年9月考取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留校担任教师，从助教做起，进而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担任过系主任、所长、副校长、巡视员等行政职务。在教学与行政工作中，对大学教育有些思考，写过一些札记、随笔，现从中选出23篇收入文集。时过境迁，这些文章对于眼下大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不一定有用，只不过是自己的心得、自己的体悟，自己珍惜而已。

年逾花甲的我，倍加怀念抚育我成长的亲人。他们给我生命、给我挚爱、给我思想、给我精神、给我意志、给我毅力、给我智慧。他们把我养育成人，我却无法报答他们似海恩情、如山恩惠。我把思念变成文字，但文字无法表达我对亲人的爱戴、感谢、怀恋、悲怆、痛悔之情。任何文字与亲人的深恩大德相比，都是苍白无力的。文集中有6篇文章，是我对外婆、父亲、母亲、岳父、岳母的追思、忆念、感怀，是不孝子孙的“寸草心”。

2006年2月，我在网上开设自己的博客。先后有“补拙斋漫话”、“师友茶座”、“菜海子部落”、“民族史部落”、“老补的BLOG”等博客。写随笔两百多篇。从中选取21篇收入本文集。这是我近两三年的一些杂感与随想。收录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杂碎”，不过是野叟献芹之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今已经整整六十年。我跟随共和国走过一个花甲的岁月。1949年我发蒙读书。1959年我进入高中。1969年我在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1979年我重返云南大学做国瑜师的研究生。1989年我担任云大历史系主任，和师生一起经历了极不平常的风波。1999年我在云南大学副校长的岗位上经历了风风雨雨。现在，我在“补拙斋”愉快地读书、教书、写书，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独来独往的潇洒岁月。这本文集，算是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穿越六十年历程的点滴记录，权充一个花甲老人献给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的一瓣心香。

2009年12月于补拙斋

# 目 录



谢 词 /1

自 序 /1

一代巨星昭千古

——纪念史学大师方国瑜教授诞辰100周年 /1

守住学术的岗位

——熊庆来校长被潘光旦批评 /10

顶风奋进挽狂浪

——高治国同志在云南大学 /13

西南边疆民族学的开拓者

——江应樑教授传略 /18

银杏不老志千里 松柏常青霞满天

——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50周年 /24

薪火相传 继往开来

——方国瑜和他的学生们 /39

大象无形

——悼念良师马开樑教授 /57

不该忘却的哲人 /61

大师与鬼才 /64

为学弃浮夸 奉献不求名

——徐文德教授素描 /66

松柏坚贞竹持节

——记黄琴竹书记二三事 /71



老滇票 /74

闪亮的流星

——追念王筑生教授 /78

大学要有大度 /88

大学因教师而存在

——在云南大学师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5

教改风行 循环往复

——大学改革的历史回顾 /106

春节忆教改 /123

创新：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键 /126

五四运动与人文社会学科

——在云南省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130

大学的品格 /133

提高人文素质 弘扬人文精神

——在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仪式上的讲话 /136

注重人文学科与人文教育

——学习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笔记 /140

面向时代 开创未来 /144

桃李芬芳 星汉灿烂

——《腾冲第一中学建校八十周年校庆纪念册》序 /149

整理古籍 弘扬文明 服务当今 嘉惠未来 /151

迎接挑战 迈向未来

——1994年全国重点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会议综述 /157

加强梯队建设 发挥群体优势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 /163

花红果硕颂改革

——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学科建设30年 /171

校园文化：大陆与台湾的比较 /177

## 研究生的特质

——给研究生的一封信 /187

选题如择偶 /190

违背学术研究规律的论文指标 /192

再谈违背学术研究规律的论文指标 /195

云大1962级

——穿越“文革”与改革的一代大学生 /199

心念情系三十秋

——勐海一中建校50周年有感 /203

爱国主义教育 与民族史研究 /207

子欲养而亲不待 /213

小小菜园四季青 /216

水映寺漫忆 /230

我心中的袁家塘 /237

高高的七层楼 /245

金湖深深 /253

从容不迫迎新年 /263

常存感激心 勿忘关爱情 /268

圣诞节闲聊文化选择 /270

国庆：从游行到游玩 /274

求真与求是 /277

是否有真实的历史 /280

无法收买的人格 /282

想起马加爵的父亲 /284

我的跃进诗歌 /286

为美好的理想 /289

色与德：本性与修养 /292



乡村图书馆的典范

——纪念和顺图书馆建立80周年 /295

盛世出猛虎 /303

盛世品茶 /306

研习茶道悟妙香 /308

清茶沏出文化香 /310

文人品茶飘书香 /312

校园文化溢茶香 /315

茶道变味难觅香 /317

如何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319

奉正朔：中华一统的象征 /321

后 记 /325

# 一代巨星昭千古

## ——纪念史学大师方国瑜教授诞辰100周年

今年2月15日是云南20世纪学术巨星方国瑜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方国瑜是20世纪云南最了不起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方志学家、教育家。他以敢于创新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刻苦认真的精神，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汉语历史、民族语言、云南文献、方志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都作出了震古烁今的杰出成就。

### 困而好学 自强不息

1903年2月15日（清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八日），方国瑜先生诞生在云南省丽江县一个纳西族的耕读经商之家。出生后，体弱多病，一岁多时大病气绝，经抢救复苏。直到三岁才开始学步，五岁时行走尚不稳。因不通汉语，九岁才发蒙读书。自谓“资质粗笨”，以勤能补拙自励。读《论语》“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不甘居下。自署书屋为“困而好学斋”，踞居书屋，终日伏案，发奋读书。所读四书五经诸子之文，至老犹能成诵。

先生曾利用假日师从当地学者和让（德谦）先生学习诗词。先后六年多，虽写了不少诗词，却没有佳作。1923年，先生毕业于旧制中学，离家赴北京求学。在向和让老师辞行时，和老师诵读《王渔洋诗话》“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生性质朴，缺乏“才”、“趣”，若肯努力，“学”、“理”可有成就。一生功力可为“学人”，不宜为“文人”。方国瑜先生认为这是“深知之言”，铭记在心，拳拳弗失。

1923年4月，方先生从偏僻的丽江山城来到文化古都北京，眼界大为开阔。当时，印度文学家泰戈尔来华讲学，列宁派苏联公使加拉罕到中国进行建交活动，梁启超到处发表宣传新思想的演讲，李大钊著文鼓吹革命。先生



见科学民主之浪潮奔腾向前，闻爱国反帝的议论方兴未艾，遂立下为国求学，为民读书的志向。旋即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这位来自边疆山城的少数民族学生以勤奋刻苦、品学兼优见重于师友，与同班好友谢伯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被推举为学生会干事。方先生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相号召，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干事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参加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在天安门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这时，北京市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创刊发行。方先生得知这个刊物的主办人是云南同乡剑川人张伯简，而早在丽江读中学时，就读过张伯简从法国寄来的宣传革命思想的读物，便主动与他取得联系，又通过张伯简认识《向导》周刊的发行人李树清。在担任全国学生总会干事期间，方先生与谢伯屿、吴平地（中共党员）等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生去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要求赶走黎元洪、曹锟，迎接孙中山来北京组建“临时政府”。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方先生被推为学生代表，进入北京火车站迎接孙中山先生入京。

1925年，方先生参加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游行示威时，他奋勇当先，与警察英勇搏斗，右臂被打伤。他不因此畏惧退缩，斗志愈高。为揭露上海“五卅”惨案的暴行，在伤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毅然率领一个学生小分队到天津、济南、南京、扬州等地宣传。返回北京后，方先生即加入云南旅京学生的左派组织“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积极鼓动革命。

1926年夏，方先生患大病住院，不久休学回家。1927年龙云等四镇守使发动“二六”政变，战乱蜂起，土匪横行，先生困在丽江，埋头读书。1929年秋，北上复学。此时，北伐军已打败直、奉军阀，首都迁往南京，北京改为北平。因挚友谢伯屿、吴平地于1927年4月与李大钊先生同时被捕，又同时慷慨就义，且大革命失败，学生组织涣散，学生运动沉寂，而“整理国故”之风方兴未艾，先生乃立志于国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争光。复学时便要求入北师大国文系本科，系主任钱玄同以先生在预科读书时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在本科二年级注册。

1930年春，在钱玄同的鼓励下，先生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启发诱导。与此同时，北师大历史系主任陈垣见

先生所写《中国道教史》颇有见地，知先生是边疆少数民族学生，十分赏识器重，指导他选修大量史学课程，并从杨树达、梁启超诸学者治史地之学。先生回忆说：“我在北京求学期间，多闻议论，开阔眼界，稍知读书门径，想以学术上成就最高的几位先生为榜样来深造，曾刻意读《章氏丛书》觉文笔深奥、论说抽象；又读《饮冰室集》觉感情奔放、议论酣畅；读王国维、陈援庵先生的文章，感到朴质存实，方法严谨。读王先生书，将创新意，作文议论；读陈先生书，有所补苴，多作札记。因此王、陈两先生对我影响较大。还有冯承钧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作数十种，也有人翻译日本学者所作西域南海论著，我都细读，增益新知。”这段时期，先生纵观四库典籍，广及海外译著，钩稽故实，发微阐幽，多有论著发表于报刊，为学术界重视。先生生前清理三十岁以前存稿，认为可取而亲自编定者，有《广韵声汇》一书（共三十八卷，分装两函十二册），《困学斋杂著五种》，包括《广韵声读表》、《隋唐声韵考》、《慎子考》、《慎子疏证》、《论学存稿》。尚有《说文声汇》、《释名声汇》、《石鼓文研究》、《论语朱注匡谬》等底稿若干册。

1932年，方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第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受聘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任编辑员；同时在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任教授。方国瑜先生靠着好学不厌、自强不息、勤奋不懈，从西南边疆一个汉语都说不清爽的少数民族学生，成为中国著名大学优秀的高才生，走上大学讲台和研究之路。

## 纳西历史文化之父

今天，东巴文化已成为国际文化界与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学科，但在半个世纪前，除丽江的东巴寺院外，尚无多少人知道有这样一个神奇的文化。1933年秋，金沙江第一湾的暑气未消，玉龙雪山已银装素裹。刚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方国瑜从北国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他此次回乡，不仅是要探望父母乡亲，也不是要游览金江与玉龙的名胜，而是要研究神奇的东巴象形文字及东巴文化。

东巴教是流行于丽江一带的巫教，以祈神禳鬼、求生御死为主要特征。其经书用原始的象形文字编写，被称为东巴字，只有少数东巴经师能读会认。多数东巴教徒虽滔滔念诵，却不解字义。1913年法国学者巴克（J.Bacot）将其在丽江游历的经历写成《麽些研究》在巴黎出版。内记300



多个东巴象形文字，其记录多有错误。方国瑜在导师刘半农的支持下怀着发掘、整理传统文化的志向，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他虚心向东巴经师求教，请著名东巴和宗道先生讲解东巴教义、传说、道场仪式等。为弄懂东巴文的确切含义，他将用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译为汉文，还翻译了若干经书的章节。他又请三个不同教派的东巴经师讲解单字及标音，作认真的比较研究，逐字逐句批注音读和含义。在此基础上写出《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初稿，再请东巴教门长老和土贵校订补充。经五个多月调查、学习、研究，写成的初稿有两三尺高。1934年6月他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不幸刘半农先生病歿，经董作宾先生介绍，他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编成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1936年他带着书稿到苏州向章太炎先生请教。章太炎先生大为赞赏，当即为之作序，称此书是研究纳西历史文化的“先导”。1939年，顾颉刚先生拟将此书列为齐鲁大学研究丛书刊印。美国学人罗伦士借口要将此书译为英文，作英汉合璧出版，将书稿盗走。50年代，吴晗、胡厚宣、周有光等著名学者都以此书有极高学术价值，敦促尽快出版。20世纪70年代郭沫若对此书极感兴趣，专门写信给方先生，希望早日改好，影印出版。

《纳西象形文字谱》于20世纪80年代初正式出版发行。这部书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把握整体，抓住本质。将纳西古文字的研究放在整个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把语言文字和社会历史的研究紧密联系起来，既理清了纳西族历史发展的线索和纳西象形文字创始的背景，又注意到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二是探索规律，善于创新。书中充分利用我国古文字学的理论遗产，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六书”之说，第一次把纳西象形文字的构造归纳为十类。不仅首次提出了纳西象形文字构造的规律，也为象形表意文字的比较研究开拓了前景。三是字谱释义既简明扼要又准确可靠。结合文字结构，分析每个字的字源；运用民族学方法，结合社会历史发展释义。这就使释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石上。每一个释义都令人信服。它不仅是一本语言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获首届国家图书奖提名等多项大奖。德国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不远万里，亲自到方先生门下求教，称他是“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方国瑜先生以求实独创的精神，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把鲜为人知的云南纳西族象形文推向全世界。

## 向西方学术界挑战第一人

方国瑜是云南学术界第一个向西方歪曲历史的所谓学者发起挑战的先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帝国主义在侵占缅甸、印支三国后，侵入我云南边疆。西方一些“东方学家”对中国西南历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想方设法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侵略政策张目，干着分裂中国的勾当。

把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就是西方学者分裂中国西南最卑劣的一个例子。他们精心虚构了一个泰族早期历史的线索：泰族最早的故土在中国北方，公元初期，由于汉人的压迫引起一系列的民族迁移的浪潮，将他们卷到中国西南。公元7世纪他们在洱海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打败唐帝国入侵的军队，形成了包括今云南、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南诏王国及宋代的大理国。由于1253年蒙古人的侵入，泰人才被迫迁到现在的暹罗。这个伪造的线索是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成为泰族复国运动的主要炮弹。这个虚构的历史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但为国外的史学家、民族学家接受、宣扬，而且国内一些学者也重复了这种观点。方国瑜力排众议，第一个向西方学术界发起了勇敢的挑战。1936年他在《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一文，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究，论证了南诏不是泰族建立的独立国家，而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子（僰人）建立的臣属于唐王朝的地方政权。1253年蒙古军队进入云南并没有引起泰人南迁。用历史事实有力地戳穿了西方汉学家们编造的谎言。方国瑜的这个论点自1950年以后被学术界广为接受。连西方和泰国的学者也改变看法，不同程度地接受这一观点。1981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在剑桥大学出版《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也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坚持南诏是泰族王国的理论。相反，有更多的资料说明应该抛弃南诏国等于泰族王国这一早已过时的错误方程。

西方民族学家曾鼓吹彝族属雅利安人种，中国西南的彝族是从西方迁来的，西昌地区的彝族是独立的罗罗王国。方国瑜依据文献资料、语言学资料、民族学资料及文物资料证明彝族渊源于中国古代的羌人，推翻了西方学者的谬论。他在《彝族史稿》中进一步强调：“彝族历史发展过程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全国整体的一部分。”

方国瑜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觊觎云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毅然改变研究方向转而考究云南史地的。他始终以学术为武器，为维护祖国统一、